

我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 new 起点

——读周振华著《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

胡培兆

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当中，产业政策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是否正确，能否得以有效实施，直接关系到产业结构调整 and 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呼唤着正确的产业政策。

然而，产业政策的正确制订和有效实施有赖于相应的理论指导。诚然，外国产业政策的成功先例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系，为我们制订产业政策所借鉴，但产业政策固有的政策属性之一，便是它比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更具有本国的特色，更具体地反映本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特点。因此，对外国产业政策照抄照搬是不行的，支离破碎地借鉴个别做法也很难达到预期政策效果，如果想凭借经验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那么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工具，在国际上兴起和普及乃是近20—30年的事情，我国只是近几年才明确提出产业政策，并把其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因此，我们对产业政策还是比较陌生的，无经验可参考。更何况，经验主义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产业政策的实践迫切需要全面的理论指导，产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要有其理论依据。

但是，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则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尤其是对产业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目前，国际上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分析的，尚停留在对产业政策的实践进行历史性的归纳、整理和经验总结的“初级阶段”水平。日本是实行产业政策比较早，并取得较大成功的国家，但日本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理论体系。我国对产业政策的研究，起步更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治著《产业经济学导论》和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杨沫著《产业政策研究》，在我国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教育的作用，但它们更多地带有介绍性的色彩。以后陆续发表的一些有关论著，其中不乏有真知灼见之作，但缺乏系统性和理论的完整性。值得庆贺的是，周振华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一书，（以下简称《分析》），对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是一部力图把产业政策分析推向深入，上升到经济理论分析的高度，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力作，是我国第一部对产业政策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有较高质量和价值的学术专著。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分析》的选题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站在一个较高的研究高度，向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冲击。这种在理论上勇于探索，富有开创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分析》的作者凭借着对东西方经济理论的深厚功底，宽广的知识面，占有的详尽资料，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高水平的论述驾驭能力和熟练的分析技巧，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对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系统分析的尝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较好地构建了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系统分析的理论框架。产业政策本身是一个复合体，而且它与其他经济政策、发展战略、体制模式、环境条件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产业政策理论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展开。问题在于，如何使各种不同角度和方面的理论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有内在关联、逻辑自然的结构体系。否则，就会出现彼此割裂，“拼盘式”的结构体系。《分析》以产业政策过程的纵向分析与产业政策内容的横向分析为基本骨架。在政策过程分析中，先以影响和规定产业政策模式的基本变量构建了产业政策总体模型，然后进一步进入政策过程的结构——功能分析，揭示基本变量对产业政策指导思想，政策模式，目标设定和手段运用，调节方式，组织机构设置以及政策效应的制约及其选择。在政策内容分析中，把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关系政策综合成产业政策体系，揭示其内在关联和整体效应。然后，在这一政策体系框架下分别对各项政策进行理论分析，指出其政策要点。这样一种政策理论研究的结构体系，不仅具有完整性，符合系统分析的要求，而且具有连贯性，符合

理论逻辑的要求。因此,《分析》一书构建的分析框架是比较科学的,结构严谨,逻辑自然,层次清晰。与那种“拼盘式”的结构体系相比,《分析》的分析框架本身就表明其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已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对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的理解已达到融汇贯通的境界。因为一种较好的结构体系的形成,其本身就是理论研究的一种质变的新飞跃。

(2)较深入地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在目前产业政策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就政策论政策,缺乏“标准”分析;二是停留于浅层次上的政策分析,低水平重复。《分析》一书对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立足于经济理论的“标准”分析,并将其研究推进到较深层次。例如,作者深刻揭示了产业政策形成的基本逻辑,深入分析了产业政策的政策属性,并以此为依据确立其在整个经济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方式。又如,作者把产业政策模式区分为管理型和协调型两种范式,对它们的决定、内在机理及其功效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产业政策模式转换的思路,并对不同政策模式下的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总之,《分析》一书对产业政策各方面问题的研究都是比较深入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分析力度,不是停留在一般认识水平上的泛泛而谈。

(3)以科学的态度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见解。《分析》一书在对产业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理论分析中,不仅视野开阔,广纳博引,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反映了作者在资料收集和整理上下了很大功夫,对国内外的有关理论及其历史发展比较熟悉,而且能够站在较高的角度对各种观点予以分析评论,并善于独立地有创见地阐述自己的科学见解。几乎在全书的每一章,都可以看到不少创新见解。例如,作者深入剖析日本学者提出的“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的内在矛盾及其政策失效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产业结构政策选择基准的新假说,即增长后劲基准,短缺替代弹性基准和瓶颈效应基准。又如,作者在分析产业政策效应时,定义了正常偏差与非正常偏差,并从空间与时间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效应的整体性偏差和结构性偏差,这就为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新的标准和工具。更有价值的是,《分析》中提出的许多精辟的新见解,均有其充分立论,有力的论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给人以较大的启发。

总之,《分析》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外产业政策理论系统研究的空白,对于产业政策理论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当然,由于产业政策经济理论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且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特别是系统经济理论研究尚很薄弱,因此《分析》一书对某些观点的阐述亦显不足,一些概括和概念尚有不明确之处,望作者能在此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为填补这项空白做出贡献。

(上接封二) 了上万字的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提纲,深化和发展了他以前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得到会议很大关注和重视。他发表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几个问题》获得了上海经济学会的优秀论文奖。

姚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高等财经教育、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姚耐同志一贯认真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忠于党的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他重视自我的党性修养和锻炼,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一起工作。他作风正派,坚持原则,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廉洁奉公,任劳任怨,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他为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不愧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

姚耐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学校的一大损失,是财经教育和经济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地学习和工作,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姚耐同志安息吧!

姚耐同志治丧委员会

1991年8月